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5.06.005

新质生产力助推后发地区高质量发展

安金凤

摘要: 推进后发地区高质量发展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举措,事关共同富裕成色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前后发地区面临科技创新资源匮乏、产业转型滞后、新质人才短缺、基础设施薄弱及生态环境约束等现实困境,制约了新质生产力效能的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先进生产力质态,通过技术革新、人才驱动、产业升级和制度创新四个维度,为后发地区突破传统发展瓶颈提供了新路径。通过构建跨区域协同创新生态,推动科技资源双向流动;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打造梯度承接体系;实施人才强基工程,深化产教融合;统筹传统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筑牢发展底座;健全生态治理体系,创新绿色开发模式。以政府政策引导、市场机制与区域协作,发挥新质生产力在助推后发地区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后发地区; 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5)06-0041-14

收稿日期: 2025-06-26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支持计划研究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双向度变革研究”(项目编号: 2025-KYY-001)。

作者简介: 安金凤(1997—),女,河北张家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E-mail: 1175382898@qq.com。

一、引言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但高质量发展“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1]。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生产力、科技水平、资源禀赋、地理条件等方面都存在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制约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2]因此,推进后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区域均衡发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途径。

就目前来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凭借改革开放的先发优势,经济发展迅速,中、西、东北部发展相对滞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702 356亿元,中部地区生产总值287 156亿元,西部地区生产总值287 350亿元,东北地区生产总值63 451亿元^[3]。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后发地区存在经济发展基础薄弱、要素集聚能力与内生发展动力缺失等问题,在推动其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情况更复杂、任务更艰巨、要求更加迫切。所以说,如何推动后发地区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4]有学者提出,“新质生产力不是任意的新的生产力,而是能够支配所有其他部门的工业部门的当前最先进的生产力,是那些能够帮助我们站在世界舞台中央的新质生产力”^[5]。从本质特征来看,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先进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相比,在技术驱动方面,传统生产力多依赖常规技术,而新质生产力依靠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推动;在产业形态上,传统生产力对应的产业相对成熟、增长缓慢,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活跃、发展迅速;制度环境层面,传统生产力适配相对稳定、常规的制度,新质生产力则需要更灵活、鼓励创新的制度体系来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带来生产效率的量级提升,更促使产业形态发生质态跃迁,既体现为前沿技术的产业化突破,更标志着全要素生产率的系统性革新,能够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6],据此,以高科技、大数据为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恰好为后发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条极具潜力的弯道超车路径。它有望打破传统发展模式的桎梏,助力后发地区跨越发展瓶颈,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高质量发展。

目前学界还未有关于新质生产力推动后发地区高质量发展层面的系统论述,当前研究多聚焦于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践进路^[7];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逻辑^[8]、实践路径^[9];加快特殊类型地区高质量发展^[10]等方面。现有研究成果未深入揭示新质生产力与后发地区发展质量提升的内在作用机制,也缺乏对特定区域发展困境的针对性突破方案,这种理论供给不足与实践需求迫切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本研究的重要切入点。鉴于此,有必要分析新质生产力在推动后发地区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并研究新质生产力驱动后发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为破解后发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藩篱制约和短板提出实践策略,为进一步增进人民福祉、推动我国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借鉴。同时,也为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竞争中培育新的比较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实现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新质生产力助推后发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驱动逻辑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后发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能,出发点在“新”,关键在“质”,落脚点在“生产力”,是技术、人才、产业、制度模式的系统性变革,这种先进生产力能为我国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提供更多可能性。基于后发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大契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而充分激发后发地区的比较优势,有助于破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

(一) 技术赋能引领: 数智浪潮激活后发地区高质量发展新质动能

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1]668}可

见,社会实践中的技术需求始终是推动科学进步的根本动力。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新一代信息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合成生物、量子计算等的颠覆性与前沿技术打破了传统的技术界限和思维框架,引发了技术体系、产业形态及其范式的深刻变革。这些变革不仅促进资源共享和知识传播,更在加快新旧增长动能转换、转变发展方式、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等方面,为后发地区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一,依托新质生产力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能够构建起多维度动态评估的可视化分析平台。该平台通过整合区域经济地理信息、产业链图谱及创新要素数据,对后发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产业基础、科研条件进行系统性诊断,可以准确识别其当前的禀赋优势与短板。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区域发展战略布局,为这些地区量身定制针对性的区域扶持政策,包括要素配置优化方案、产业梯度培育路径、基础设施提质工程等个性化政策供给。这种数据驱动的科学决策机制,能够有效促进区域发展要素的高效配置,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提供创新性解决方案。

第二,针对后发地区生态脆弱与发展诉求的结构性矛盾,新一代清洁能源技术有助于开辟出一条可持续发展路径。以绿色能源技术中的智能微电网技术为例,它能为后发地区构建独立、稳定且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在偏远的后发地区,传统电网覆盖成本高、供电稳定性欠佳,限制了当地产业发展与居民生活质量提升。而智能微电网整合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并搭配高效储能设备,实现能源的就地生产、存储与分配。通过先进的智能控制系统,可根据实时用电需求精准调控能源输出,避免能源浪费。比如在一些山区村落,利用小型水电和屋顶光伏组建微电网,不仅能保障村民日常生活用电,还能为农产品加工等小型产业提供稳定电力,支撑产业发展,打破能源瓶颈,推动这些地区朝着绿色、高效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迈进。

第三,5G、物联网等新技术也为后发地区完善基础设施带来了机遇。5G网络的广泛覆盖能够显著提升通信效率,打破信息孤岛,使远程办公、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得以高效开展。物联网技术应用于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实现了智能管理与监测。智能交通系统可优化交通流量,缓解拥堵状况;能源物联网能够精准调控能源供应,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这些改变改善了地区发展的硬件环境,增强了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为后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根基。

(二) 人才驱动聚势:雁阵效应释放后发地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在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12]。新质人才,正是顺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活跃于新业态、新领域、新赛道,具备专业技术特质的创新型拔尖人才。在后发地区,新质人才所蕴含的知识、技能与创新能力,能够为其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的“智”动力。

第一,新质人才拥有跨学科、多领域的知识背景,不仅实践操作能力娴熟,还具备出色的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他们能够依据后发地区的独特特点与实际需求,灵活调配自身能力资源,为增强当地经济的动能与势能,提供极具针对性的支持与服务。例如,在乡村振兴实践中,来自数字农业、生态工程和电子商务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团队,能够构建“智慧农业+品牌营销”的产业链闭环。他们既可借助卫星遥感技术优化梯田灌溉系统,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又能悉心指导农户搭建直播电商矩阵,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还擅长整合当地文旅资源,打造独具特色的IP,吸引更多游客,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第二,新质人才能够引领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通过赋能“产业链”,促进产才“双向奔赴”,助力厚

植后发地区的发展潜力。他们通过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孵化器及飞地研发中心,将外部丰富的科研资源与本地实际需求紧密连接起来,推动科技成果在地转化。例如,生物医药人才可联合高校开发道地药材深加工技术,形成特色产业链;电商运营人才可搭建县域数字营销网络,打通农产品上行通道。这种“外脑+本土化”的创新模式,能激活内生增长动力,形成“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协同发展的生态闭环。

第三,新质人才不仅是技术载体,更是知识传播者和组织变革推动者。他们通过“导师制”培训、技能工坊等方式,系统性提升本地劳动者数字素养与职业技能,培育“本土化新质人才梯队”。例如,乡村数字经济带头人可培养农民主播、物流运营等新型职业群体,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智能制造工程师可为企业定制技术骨干培养计划,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种“引进一人、带动一域”的裂变效应,能够有效突破传统人才单向输入的局限,构建起后发地区自我造血、持续迭代的人才发展机制,为后发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质人才支持。

(三) 产业升级筑基: 集群培育打造后发地区高质量发展核心引擎

新产业是指应用新技术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技术及知识高度密集、附加值高、融合性强、渗透性强等特点。它能够在充分发挥后发地区地域独特性的同时深入挖掘地区产业的多元化价值,从而推动后发地区在未来农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创新型融合产业中找到新赛道,提高后发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一,新质生产力驱动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通过技术渗透与场景应用相结合,创造新产品架构、商业模式和新消费需求,有助于打破后发地区传统产业的低效发展困境。以农业现代化转型为例,人工智能与农业生产体系的深度融合,可实现精准化种植、智能化管理和数字化营销。这种产业升级不仅提升了土地产出效率,也规避了传统农业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的弊端,通过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协同共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第二,新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高技能就业岗位,吸引人才回流并倒逼本地教育体系改革。以大数据产业为例,其在后发地区的落地不仅需要技术人才,还催生了数据标注、数字运维等新兴职业,形成“引进高端人才—培训本土劳动力—培育技能生态”的良性循环。同时,新产业的知识密集型特征推动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通过订单培养、实训基地共建等模式,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为产业持续升级提供人才支撑。

第三,新质生产力的新产业具有强关联性和高开放性,能够打破地理空间限制,推动后发地区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例如,跨境电商平台帮助特色农产品直接对接国际市场、数字服务外包产业使偏远地区参与全球软件研发、新能源产业链则通过“飞地经济”模式实现跨区域资源整合。这种“无边界”的产业协作模式,既提升了后发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又融入产业协同效应促进区域间均衡发展,为高质量发​​展开辟新路径。

(四) 制度革新固本: 机制重构夯实后发地区高质量发展政策根基

政策环境的优化对调动后发地区创新主体活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培育内生增长动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至关重要。新质生产关系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伴生现象和支撑其发展的生产关系,能够为后发地区的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基础条件。

第一,创新的金融政策和多元化投融资机制,能够显著提升金融机构对后发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适配性。通过“债权+股权+保险”的全周期融资服务矩阵,既能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结

构性矛盾,又能通过风险共担机制提升金融机构服务意愿。这种制度创新不仅为企业提供覆盖种子期、成长期到成熟期的差异化资金支持,满足企业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更能切实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与准入门槛,助力培育以专精特新企业为引领的创新产业集群。其深层价值在于激活区域创新生态,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持续动能,最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有机统一。

第二,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新型产权制度的构建与规范化数据要素交易平台的建立,为打破区域间生产要素流动梗阻提供了制度性解决方案。通过构建全国统一的确权登记体系、市场化价值评估机制和跨区域要素流通政策框架,能够有效引导发达地区的前沿数字技术、绿色创新专利和高素质人才资源向后发地区转移。这种制度性创新不仅打破了传统要素市场的行政边界限制,更重要的是,通过激活知识溢出效应和技术扩散机制,激活后发地区长期沉淀的创新要素,为区域协调发展增添新的增长动力。

第三,“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13],深刻体现了尊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精准施策的原则,能有效引导后发地区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在产业价值链中精准定位优势细分领域。具体而言,可以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筛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一县一策”的靶向培育模式,显著提升特色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这一制度创新,既遵循了生产力布局的客观规律,又通过制度供给的精准性破解了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为构建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区域经济新格局提供了制度保障,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三、新质生产力助推后发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越深入,越要注意协同。”^[14]当前我国后发地区受制于自然地理禀赋局限、经济基础薄弱等多重因素,新质生产力的助推效应呈现梯度衰减特征,成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突出瓶颈。基于对典型后发地区的实证分析发现,其高质量发展提升的制约因素主要集中在科技创新、产业转型、人才储备、基础设施、生态资源五个层面。因此,深入剖析后发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薄弱环节,才能“对症下药”,为新质生产力助推后发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一) 科创资源不足与创新环境欠佳

新质生产力需要科技创新的支撑。据《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4》显示,我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得分为78.43分,比上年提高1.30分,创新生态系统呈现整体优化态势。但区域间创新鸿沟依然显著:山西、云南、内蒙古、青海、新疆和西藏六省区指数得分集中在33.90~46.87分区间,反观北京、上海等第一梯队省份以85.37分的平均得分领跑,形成“东强西弱”的显著梯度差。

与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在创新资源配置上还存在较大差距。如在科研经费投入方面,受制于地方财政薄弱与市场化融资渠道狭窄等结构性矛盾,多数后发地区科技支出高度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但这类资金往往具有定向使用、短期项目化的特征,难以形成稳定持续的研发投入机制。《202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显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呈现显著地域差异: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浙江、安徽东部及沿海经济强省(市)的投入强度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65%),其中六省(市)的(R&D)经费均超过千亿元,广东省一地的(R&D)投入甚至高于西部地区之和。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内蒙古、广西、青海和新疆科研投入强度均不到1%,区域创新发展的马太效应愈发凸显。

除此之外,创新生态的系统性薄弱更制约着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后发地区的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平均孵化 29.34 家高新技术企业,而全国的平均数值则为 77.36 家^[15];科技型中小企业也不到全国总数的 20%;除安徽拥有 8 个国家大科学装置以外,其余也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江苏等发达地区。这种创新要素的匮乏导致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适配度双低,难以有效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而且它们长期处于创新洼地,缺乏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据《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25)》显示,各区域内部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差异仍然较大,且区域科技创新水平整体呈现“东南强、西北弱”的特征,可能形成创新要素的虹吸效应。与此同时,后发地区还欠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科技产出,例如从技术市场成交额来看,2023 年,民族 8 省区成交总额仅占全国成交总额的 1.70%。在全球科技创新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后发地区科技创新滞后会延缓整体科研的进展,导致基础领域难突破,形成制约颠覆性技术的战略布局,进而成为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枷锁,影响整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 产业转型滞碍与承接体系薄弱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依托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近年来,粤港澳、长三角等先发地区通过汇聚创新资源,成功培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引领型产业集群,构建起以创新为引擎的经济增长极。然而在我国广袤的后发地区,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步履维艰、高新技术产业承接能力薄弱等问题依然突出,这种发展势差正成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制约。

截至 2024 年底,我国培育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分化特征。其中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已达 80 个,有 47 个集中在东部地区,占比近 60%,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各 13 个、东北地区 7 个,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以及创新型产业集群也主要分布在环渤海、长三角、川渝、大湾区四大经济圈以及中部“两湖”地区。2025 年 3 月,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发布的创新型产业集群主要经济指标中,东、中、西和东北部地区的企业总数分别为 32 280、9 597、6 221、4 743^[16]。从整体上来看,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进程加快,但在产业腾笼换鸟、落后产能淘汰、盘活闲置资源等方面成效不足。值得关注的是,东部地区已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形成先发优势。而中西部多数地区仍主要以装备制造、金属冶炼等传统产业为主,普遍面临“不会转、不敢转、不愿转”的问题,导致后发地区面临难以从资源依赖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的困境。

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协同角度来看,落后地区若想实现产业结构的迭代升级,势必要与产业先发地区进行产业联动。随着《关于推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指导意见》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中西部地区迎来产业承接的战略机遇期,甘肃、云南依托矿产资源承接冶炼产能,宜昌借力水电优势布局新材料,绵阳则通过创新要素集聚吸引电子信息产业,形成各具特色的承接模式。产业转移不仅带来经济增长新动能,更通过就业扩容、技术溢出等效应激活区域发展活力。但需清醒认识到,东部沿海地区在向全球产业链高端攀升过程中,向外转移的产业主要集中在传统加工制造、资源依赖型领域。

所以说,当前中西部后发地区在产业承接过程中仍面临几个问题:其一,要素支撑体系存在结构性短板。尽管交通、数字基建等硬件设施持续改善,但技术人才储备不足、金融服务配套滞后等软环境缺陷,导致出现产业承接“软着陆”障碍,制约区域产业协同效能释放。其二,资源禀赋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足。后发地区传统生产要素优势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需求形成错配,这种供需矛盾不仅迟滞产业转移进程,更可能引致“低端锁定”风险。其三,生态红线约束持续收紧。高耗

能、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持续转入,不仅消耗土地、能源等基础生产要素,加剧资源环境压力,更可能固化传统发展路径,削弱区域经济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的内生动力。如何破解这些深层矛盾,将成为重塑区域产业格局的关键所在。

(三) 新质人才短缺与产教融合滞后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供给的不足成为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2023全球数字科技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数字科技人才总量虽以12.8万人的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但数字科技高层次人才只有0.7万人,说明当前我国仍面临着高层次人才短缺问题。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这种人才供给的结构性矛盾在中西部后发地区尤为突出,形成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

从地域分布来看,人才流动的“虹吸效应”持续加剧区域发展失衡。北京、上海、深圳等超一线城市凭借其优质教育资源、创新平台和就业机会,汇聚了全国大多数数字经济高端人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西部后发地区受制于产业基础薄弱和创新要素匮乏,不仅难以吸引外部人才,本土培养的优质人才也呈现流失态势,人才流动的“孔雀东南飞”现象仍在持续。除此之外,从行业流动看,高端人才在行业间的流动也较为集中,以互联网科技、金融创新、数字经济和高端房地产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领域,凭借其技术密集性、资本聚合性及创新溢价能力,持续吸引高端人才向沿海经济圈和核心城市群集聚。相较之下,以传统制造业、基础性服务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产业升级动能不足、价值创造效率偏低,在区域人才竞争中渐显颓势。此类产业多分布于中西部产业转型滞后区域及县域经济单元。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下,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向后发地区延伸,但当地人才储备与产业需求间的“代际断层”愈发明显。一是其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体系仍以传统学科为主导,前沿领域课程设置滞后,且师资力量薄弱。例如西藏、青海、宁夏的职业高等学校数量分别为7所、12所、21所,在全国学校数量中占比均不到1%,专任教师分别为2937人、5119人、9509人,在全国专任教师数量占比中均不到0.5%。毕业生难以匹配智能化、数字化岗位的技能要求;二是校企合作则陷入校热企冷的僵局,企业真实技术需求未能深度嵌入人才培养方案,实训设备更新周期普遍落后产业技术迭代,导致毕业生技能与岗位要求形成结构性错位。这种教育供给端与产业需求端的脱节,导致外来高端产业因缺乏适配人才而难以扎根,本地传统企业因技术人才匮乏而升级乏力,进一步加剧区域间创新势能差。更深层次上,产教协同机制缺失使得科研院所创新成果难以转化为适配地方特色的生产力,最终弱化了新质生产力对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支撑作用。

(四) 传统基建滞后与新型基建薄弱

历经多年的大规模建设,我国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已跻身世界前列,下一步我国将步入补齐各地区之间基础设施短板以及大力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部分后发地区,传统基建的历史欠账与新型基建的布局滞后形成叠加效应,导致新质生产力培育所需的要素聚合效应难以形成,区域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制约了整体发展效率。

中西部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卫生、医疗、环保等公共服务和应急保障基础设施缺失^[7]。以教育和医疗为例(表1),2023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为1017.37万张,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7.23张,乡镇卫生院床位数150.45万张,仅占全国卫生机构床位数的14.8%,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6.52张,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②。后发地区不仅医疗体系尚不完善,基层医疗机构设施水平不足,

还面临着地区间、城乡间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能力不均衡,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尖端医疗资源流失等问题。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2019~2023年间东部地区教育经费从18 832亿元增加至2023年的25 850亿元,增幅达37.3%;同期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分别增长32.8%、27.5%和15.4%,虽保持增长态势,但绝对差距仍在持续扩大^⑧。

表1 2019—2023年我国各地区教育经费与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年份	各地区教育经费(亿元)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万张)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部	全国	乡镇	乡镇床位数占比
2019	18 832	9 247	11 471	2 424	880.7	136.99	16%
2020	20 941	10 128	12 393	2 549	910.07	139.03	15.3%
2021	22 307	10 698	13 299	1 662	945.01	141.74	15%
2022	24 283	11 228	13 853	2 664	974.99	145.59	14.9%
2023	25 850	12 278	14 626	2 797	1 020	151	14.8%
年均增长率	8.24%	7.34%	6.26%	3.64%	—	—	—

在新型基建领域,我国虽已形成较强整体竞争力,但区域分化特征显著。从2024年中国新型基础设施竞争力指数得分来看,全国均值达到77.23分,后发地区普遍处于第三(75.47分)、第四梯队(69.45分),低于全国平均得分及中位数(76.74分)水平。在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方面,以东北地区为例,其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为190.1亿GB,仅占全国总接入流量的5.6%。另外,截至11月末,东北地区的5G移动电话用户0.68亿户,占全国总用户数的6.8%;1 000Mbps及以上固定宽带接入用户渗透率为23%;5G基站26.6万个,占全国总基站数量的6.3%,低于全国和东部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水平^⑨。在融合和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24年“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试点的10个城市(上海、沈阳、南京、苏州、宁波、青岛、武汉、广州、深圳、成都)多数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区域。这种差距受经济积累、传统基础设施积累、制造业产业发展以及创新资源积累等关键性因素影响,使得后发地区既缺乏传统制造业基础支撑,又难以获取新型生产要素,导致新基建的乘数效应难以释放,客观上加剧了区域发展“数字鸿沟”的扩大。

(五) 生态环境脆弱与资源开发粗放

我国在推进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进程中,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绿色转型。随着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呈现稳中向好态势,环境安全防线持续筑牢,但正如《2023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所警示,“生态环境状况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17]。当前我国已全面迈入绿色化、低碳化发展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

当前我国西部、东北等欠发达区域普遍面临生态环境脆弱与资源开发模式粗放的挑战,这种结构性矛盾正日益制约着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助推效能。我国多有生态脆弱区与资源富集区空间重叠的后发地区,它们脆弱的生态系统难以承受粗放的开发方式,如西北干旱区超采地下水导致绿洲萎缩、西南喀斯特地貌区矿产开发加剧石漠化风险、青藏高原草场过度放牧诱发冻土退化等。这些资源开发行为往往沿用“采厚弃薄、采富弃贫、采易弃难”的落后模式,这种发展惯性正在形成难以破解的锁定效应。

一方面,生态系统的敏感性对新兴产业布局形成刚性约束。以青藏高原为例,尽管坐拥清洁能源与数字经济的天然禀赋,但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恢复周期长达百年,使得5G基站建设每推进一公里、光伏板阵

列每拓展一亩,都需要支付远高于常规地区的生态成本。这种生态承载力与产业升级需求的错配,使得后发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时既面临绿色准入门槛的制约,又承受着错失发展机遇的焦虑。另一方面,这些地区往往依赖传统资源型产业维持经济运转,但粗放式开发模式加剧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生态退化,不断压缩着环境容量空间。据统计,西部地区地下水位因煤炭开采而下降1~12m,多数区域已经下降至基岩面以下,逼近或甚至低于该区域植被的“生态水位”^[18],以干旱灌丛草原为主的西部生态脆弱矿区地表生态受到严重威胁,极有可能造成地表径流干涸、植被退化、生态群落消亡等局部区域生态环境不可逆的破坏。当有限资源被迫用于生态修复而非产业升级时,智能装备制造、循环经济等新兴业态难以获得成长空间,这种发展困局恰似生态系统的代谢锁定,亟待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实现破局。

四、新质生产力助推后发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度演进的背景下,全国围绕新质生产力相继作出战略部署,特别是后发地区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动和谋划全面深化改革”^[13]。在以新质生产力助推后发地区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应通过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政策倾斜引导发达地区创新资源向后发地区定向流动,同时依托发达地区和大型市场主体构建跨区域产业协同网络,使后发地区既能深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价值链,又能依托本地特色形成错位竞争优势,最终在新型举国体制框架下实现突破,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可复制的实践范式。在具体实施路径上,必须高度关注后发地区内部的巨大差异性。生态脆弱区、资源型城市、革命老区等不同类型区域面临的核心挑战与发展基础截然不同,需在统一战略框架下实施分类指导、精准施策,确保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既能契合国家战略方向,又能有效破解地方发展痛点。

(一) 外引内育协同创新,构建全域创新生态

科技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其持续深化已成为激活创新潜能、驱动后发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口。当前区域发展格局中,由于创新资源基础薄弱与要素流动不畅的双重制约,后发地区单纯依靠内生性创新已难以突破发展瓶颈,亟待构建跨区域的协同创新机制,通过东西部协作的科技要素流动、精准化政策供给和创新生态系统培育,将发达地区的创新势能有效转化为后发地区的发展动能,最终实现新质生产力在空间布局中的结构性跃升。

政府应构建系统化政策支持体系,强化后发地区创新发展动能。政府构建系统化政策支持体系:持续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设立专项科创基金,重点投向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领域;实施区域差异化税收激励政策,如对投资后发地区科创企业的机构给予所得税优惠,对技术交易收入减免增值税。深度融入国家战略,如“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与后发地区共建多层次协同创新共同体,如“飞地经济”“离岸孵化”。完善科研项目合作与创新成果共享机制,对跨区域联合申报项目优先支持。对生态脆弱区(如青藏高原),重点支持生态修复、高原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技术研发与转化,推动建立“国家生态安全技术创新中心”,对生态科技人才实施更优个税政策。对资源型城市,重点支持资源精深加工与循环利用、替代产业核心技术研发,鼓励与大型资源央企共建联合实验室,设立“产业转型技术领军人才”计划。对革命老区,重点支持特色农产品加工、红色文旅数字化技术,深化与对口支援省市的科创合作,实施“本土人才回归工程”和“新乡贤计划”。

发达地区可设计与后发地区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一是打造东西部科创共同体。借鉴“研发在东部、

转化在西部”的飞地经济模式，通过政策引导形成要素互补格局——东部地区发挥技术研发、资本运作和市场网络优势，西部地区释放土地资源、人力资源及产业链配套潜力，在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共建跨区域产业协作平台。二是依托上海技术交易所、深圳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等东部技术市场载体，设立西部技术转化专区，探索专利拍卖、技术众筹等创新交易模式。同时建立技术经纪人跨区域执业机制，促进科技成果精准匹配西部产业需求。三是推动东部国家重点实验室、大科学装置向西部企业开放共享，建立科研设备跨区域预约使用平台。持续策划“院士西部行”“技术转移直通车”等品牌活动，针对西部地区特色农业、生态治理等领域开展定向技术攻关，构建长效化的东西部科技协作网络。活动重点应结合区域需求，如为生态脆弱区定向攻关特色农业、生态治理技术；为资源型城市提供智能矿山、循环经济解决方案；为革命老区引入智慧农业、普惠民生科技。

（二）推进产业数智转型，打造梯度承接体系

对于后发地区而言，产业数智化转型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打破传统路径依赖、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破局关键。这需要兼顾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外部技术赋能，通过系统性布局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集聚，形成良性互促的发展生态，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当前数智技术正重塑传统产业格局，为后发地区创造创新的机遇。对于后发地区而言，需突破“唯GDP导向”思维，立足资源禀赋与国家战略需求双向匹配，筛选技术迭代窗口期长、环境约束低且能激活本地优势的产业，这种发展思维既规避了传统路径的环境代价，又能激活区域特色资源的乘数效应。例如青海可依托盐湖锂资源与光伏资源优势，重点发展“盐湖提锂—储能电池—绿电消纳”闭环产业链，打造世界级清洁能源产业集群；云南可发挥生物多样性优势，聚焦三七、天麻等特色药材开发创新药、健康食品，建设生物医药高地。对于缺乏先天资源优势的地区，则可借力“东数西算”“东数西存”等国家战略，如甘肃庆阳可利用气候凉爽、能源充足的条件，承接长三角算力需求，建设零碳数据中心集群，开辟数字经济新赛道。这种发展模式既是对传统工业化路径的超越，更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诠释。

为破解后发地区产业转型滞后与承接体系薄弱的发展困局，需构建以数智技术为引擎的产业升级新范式。首先需要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与政策引导。一是通过建立产业承接能力评估指标体系，明确后发地区产业数智化承接方向，并参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梯度有序转移协作机制”^[13]，建立跨区域产业转移利益共享平台，推动产值、税收、生态补偿等指标合理分配。二是强化数字基建与要素保障，设立千亿级数智新基建专项基金，重点投向中西部5G基站、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中心等新基建。三是建立“负面清单+机会清单”，通过负面清单严控低端产能转移，依托机会清单引导算力中心、数据标注基地等数字产业西迁；配套阶梯式税收优惠和靶向性产业基金，重点吸引具有链主效应的龙头企业、大型的优质产业项目落地，带动形成服务器制造产业集群、算力服务生态圈等数字经济新高地。其次需要发达地区的资源协同与经验输出。一是以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为产业链主，联合后发地区共建“数字飞地园区”，如江西与深圳合作的电子电路产业园模式，将设计研发留在东部，生产制造环节梯度西迁，形成跨区域产业链分工。二是推广“数字特区”经验，推动杭州城市大脑、深圳智慧中枢等数字治理平台向中西部开放源代码，共建政务云服务平台和产业智能中枢。三是组织“帮扶联盟”，鼓励东部高校、科研院所与后发地区联合攻关产业共性技术。总之，与生态脆弱区协作重点在生态技术输

出和绿色产业共建；与资源型城市协作聚焦循环经济技术和高端制造转移；与革命老区协作侧重特色农产品加工、文旅运营和电商服务。

（三）实施人才强基工程，深化产教协同机制

人才作为知识经济的核心要素，已成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战略支柱。面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命题，后发地区亟须突破传统人才政策框架，以“高精尖缺”这一现实要求为导向，构建覆盖引才、育才、留才全链条的创新生态。

在创新人才引进方面，构建“候鸟式”柔性引才体系。政府要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升级需求，精准编制人才目录，定向引进领军型、技能型人才，也要破除“唯学历”固化思维，优先引进能解决实际问题、推动产业落地的实用型人才；借鉴海南自贸港2025年1月24日发布的对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个税优惠超过15%部分免征的创新实践，设立专项人才发展基金，形成“以待遇引人、以事业聚人”的制度保障。同步推进跨区域智力协同，通过在长三角、粤港澳设立“人才飞地”，实现“研发在飞地、转化在本地”的创新循环。如山东郯城借力复旦大学等机构打造高分子材料研发中心，开创“异地比赛+本地转化”的跨区域引才机制，共享高端人才资源。同时激活乡贤资源，实施“鸿雁归巢”工程，以乡情纽带、创业扶持等组合拳吸引人才回流。

在创新人才培育方面，构建“靶向化”人才培养体系。在生态脆弱区，高等职业学校增设生态保护、环境监测、清洁能源运维、生态旅游服务专业。培养本地化生态管护员、技术员。在资源型城市，高校优化学科向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倾斜。职校深化校企合作，培养高技能工人和现场工程师。强化再就业培训。在革命老区，强化涉农专业（智慧农业、电商物流）、文旅服务专业（导游、文创）、手工艺传承。开展“领军人才”和“乡村工匠”培训。

在创新人才留用方面，构建“磁吸式”长效稳才体系。政府可以通过创新“揭榜挂帅”“赛马机制”等激励机制，对关键岗位实施协议工资制与绩效单列，对技能领军人才推行市场化年薪制度，同步配套专项奖励基金，全面提升区域人才竞争力。同时优化编制资源配置，为高层次人才提供“周转池”，打破编制壁垒对引才的制约。服务保障层面应升级人才服务体系，建立“一站式”人才服务中心，集成住房保障、子女教育、医疗健康等关键服务，系统性解决人才后顾之忧，切实增强人才归属感。也要赋予科研人才技术路线决策权、经费自主权，设立创新试错专项资金，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科研文化，真正让人才“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四）加快基建迭代升级，构筑智能融合网络

基础设施建设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基石和创新引擎。在国家战略全局中，需以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双基”协同发展，在着力补齐后发地区交通、医疗等传统基建短板的同时，更要前瞻性布局以5G网络、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新基建，进而为构建全域联动、优势互补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筑牢数字底座和发展根基。

在传统基建维度，应牢牢把握交通“先行官”定位，切实贯彻“要致富，先修路”的发展智慧。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已被证明是提高生活质量和促进后发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政府应给予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特殊地区建设资金补助，一方面实施自然村道路硬化全覆盖工程，将交通建设深度融入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另一方面创新“道路养护+就业帮扶”机制，通过开发物流配送员、

乡村护路员等公益性岗位,形成“修一条路、兴一方业、富一方民”的良性循环。在公共服务均等化层面,数字技术正成为破解城乡鸿沟的利器。远程医疗系统可以让三甲医院专家走进村卫生室,5G+VR教学使山区孩子置身名校课堂,云端职业技能培训则为农村劳动者开启职业发展新通道等等,这些创新实践有助于解决医疗、教育等领域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提升区域发展的整体均衡水平。

后发地区需以产业链需求为导向,在重点行业、重要领域构建适度超前、弹性扩展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可构建“一业一策”的精准布局模式:矿产资源富集区应侧重矿山物联网、智能勘探设备等建设;农业主产区需优先布局农产品溯源系统、智慧冷链物流;传统工业基地则需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绿色能源、数字贸易、产品溯源等平台建设。以黑龙江为例,通过智能农机与数字农场结合的立体化布局,不仅实现了黑土地保护与粮食产能提升的双赢,更催生出农业大数据服务等新业态。在补齐公路、铁路、通信水利设施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根据现实发展需要,有规划、有重点地加快推进5G、新能源充电桩、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布局,尤其是推进“5G+工业互联网”“5G+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等的跨区域共建共享,支持有条件的区域建设新质生产力发展试验区,推动形成东西联动、优势互补的创新生态圈,最终实现技术溢出与区域发展的同频共振。

(五) 健全生态治理体系,创新绿色开发模式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9]。在此背景下,必须把后发地区生态保护修复置于优先地位,既要坚决转变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带来的资源透支和环境代价,更要创新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所以说,如何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推动后发地区绿色转型,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我国部分经济后发地区承担着重要生态屏障功能,囿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约束,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尚未健全。对于跨区域、受益主体不明确的生态服务,中央财政应通过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生态综合补偿等纵向转移方式强化支持。同时探索建立市场化补偿机制,通过碳汇交易、水权交易、生态标签认证等方式拓宽补偿渠道,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化补偿体系,例如,可借鉴发达地区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银行”经验,通过确权登记、价值评估、市场交易等环节实现生态资源资本化。在制度保障层面,建议政府加快制定《生态脆弱区保护条例》等专项法规,严格划定资源开发红线,刚性约束环境执法蓝线,严控“两高”产业准入黄线。同时设立绿色发展专项基金,重点支持后发地区发展生态农业(如云南普洱有机茶园)、清洁能源(如甘肃风电光伏基地)、生态旅游(如贵州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区)等特色产业。借鉴江苏“节地模式”,通过土地复垦、闲置用地盘活等方式提高单位土地产值,避免粗放扩张,通过循环经济模式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政府主导应用清洁能源技术,例如在青藏高原实施“光伏+生态修复”工程,采用支架高度可调的漂浮式光伏系统,配合高寒草甸人工恢复技术,实现发电效率与植被覆盖率同步提升。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运用In SAR卫星遥感技术监测冻土退化速率,提高无人机巡检覆盖率,利用地质大数据分析实现矿产采掘路径优化,提升将贫矿利用率。

在区域协作维度,发达地区应当践行“五个赋能”责任:一是技术赋能,由发达地区牵头设立技术转移中心,通过专利共享、设备租赁等模式向后发地区输出污染治理、清洁能源等关键技术,形成全链条技术帮扶体系;二是产业赋能,与后发地区共建生态产业园区,例如浙江与四川共建“东西部协作循环经济

园”,重点承接生物医药、绿色建材等环境友好型产业转移,同步构建碳排放监测与补偿机制;三是金融赋能,鼓励金融机构发行“生态债券”的方式,重点支持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等具有文化生态双重价值的项目;四是碳交易赋能,在碳交易方面进行联动,推动后发地区林业碳汇纳入发达地区碳市场交易,例如上海与贵州合作开发“森林碳汇交易项目”,探索开发可量化的生态碳汇产品;五是人才赋能,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选派环境规划、生态修复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开展对口支援,同时,发达地区高校设立“生态保护专项奖学金”,定向培养后发地区环境工程、生态旅游专业人才,并建立毕业生返乡服务激励机制。

注释:

- ①数据来源:《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4》。
- ②数据来源:《202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 ③根据“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服务平台”各省市入库名单公告整理得出。
- ④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分地区技术市场成交额计算得出。
- ⑤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 ⑥数据来源:《2023全球数字科技发展研究报告》。
- ⑦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4》。
- 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公开数据整理而得。
- ⑨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and 科技部公开数据整理而得。

参考文献:

- [1] 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N].人民日报,2021-03-07(001).
- [2] 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EB/OL].(2019-12-05)[2025-03-01].https://www.gov.cn/xinwen/2019-12/15/content_5461353.htm.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5-02-28)[2025-05-28].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2/20250228_1958817.html.
- [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01).
- [5] 余斌.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辩证关系[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8):33-40+126.
- [6] 习近平在宁夏考察时强调 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奋力前进 确保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N].人民日报,2016-8-2(001).
- [7] 蒋晟,贺灿飞,李志斌.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理论逻辑与实现进路[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5-14.
- [8] 蒋永穆,冯奕佳.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现实表现与路径选择[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1-12.
- [9] 叶振宇,郑韬.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基本逻辑与实践路径[J].齐鲁学刊,2024(5):125-134.
- [10] 高国力,贾若祥,徐睿宁.加快特殊类型地区高质量振兴发展研究[J].经济纵横,2022(7):78-84+2.
-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新路[N].人民日报,2015-03-06(01).
- [13]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2024-07-18)[2025-05-01].https://www.gov.cn/yaowen/libiao/202407/content_6963409.htm.
- [14]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强调:抓好各项改革协同发挥改革整体效应 朝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聚焦发力[N].人民日报,2017-06-27(001).
- [15]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支撑后发地区高质量发展——以浙大衢州“两院”为例[EB/OL].(2024-06-12)[2025-05-01].<https://kjj>.

- hebi.gov.cn/kjdt/art/2024/art_3b7bb4687d684b2eadb314ee4e9f3c4b.html.
- [16] 2023年创新型产业集群主要经济指标.[EB/OL].(2025-03-06)[2025-05-01].<http://www.chinatorch.gov.cn/kjfw/tjsj/202503/e8c03fcc6d214ed48a25d06ba265486a.shtml>.
- [17] 生态环境部发布《2023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EB/OL].(2024-06-06)[2025-05-01].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6/content_6955727.htm.
- [18] 王双明,黄庆享,范立民,等.生态脆弱矿区含(隔)水层特征及保水开采分区研究[J].煤炭学报,2010(1):7-14.
- [19] 政府工作报告[EB/OL].(2025-03-12)[2025-05-01].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3/content_7013163.htm.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Boos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AN Jinfeng

Abstract: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ed region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people's well-being,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success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urrently, underdeveloped areas are facing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lack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sources, lagging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shortage of new-type talents, weak infra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aints, which have restricted the full releas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As an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 modality that takes innovation as the core driver,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rovides a new path for the underdeveloped regions to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of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four dimension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alent driv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Build a cross-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cosystem to facilitate the two-way flow of sci-tech resources; advance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es and establish a gradient industrial undertaking system; implement talent capacity-building initiatives and deepe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ordin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and new infrastructure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improve the ecologic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innovate green development models. It is emphasized that by virtue of government policy guidance, market mechanisms, and regional collaboration,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ivotal rol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boos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ess-developed regions, thereby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underdeveloped Region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周兴涛